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研究

(2018)

总第19卷

王立胜 胡家勇 主编

卷外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研究

(2018)

总第19卷

王立胜 胡家勇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2018: 总第 19 卷/王立胜, 胡家勇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 - 7 - 5203 - 3311 - 5

I. ①中… II. ①王…②胡…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①F1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329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王超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8.75
插页 2
字数 307 千字
定价 8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金富	王立胜	王振中	王维国	卢现祥	朱方明
朱恒鹏	任太增	任保平	刘秉龙	齐 兰	纪玉山
杜曙光	李 政	李 涛	杨春学	邱海平	邹 薇
沈坤荣	宋丙涛	张 平	张 宇	苏 剑	周云波
周 文	周 冰	赵学增	胡亦琴	胡家勇	侯风云
洪名勇	宣 焯	钱 津	徐丹丹	高友才	黄茂兴
程恩富	景维民	董长瑞	韩 鹏	焦方义	谢 地
蔡继明	裴小草	裴长洪	樊 明		

目 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提炼和总结

六大经济实践经验 程承坪 (1)

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定位 于金富 (28)

关系的重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政治经济学解读 郑尚植 王怡颖 (39)

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农地制度改革的

政治经济学分析 周绍东 田 斌 (5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非物质商品价值及其实现的理论探讨

——纪念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问世 150 周年 孔陆泉 邹富良 (7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高增长到新常态

——中国的结构性改革 段文斌 (89)

我国产业发展的四大问题 卢现祥 (113)

基于资本理论的城市化规律新研究 陈建华 (129)

基于产业聚变视角的可持续城镇化路径分析 王 俊 王树春 (141)

我国粮食安全与农地供给侧改革 程世勇 (156)

农业供给侧改革下传统农区政策性土地流转纠偏 杨玉珍 (169)

[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

我国农村进城务工群体与城镇居民的多维贫困比较研究

——基于 CHIP 2013 数据的定量分析 周云波 贺 坤 (184)

劳动收入份额、总需求与劳动生产率

——理论分析与中国的经验研究 邹 薇 袁飞兰 (203)

[经济全球化与对外经济关系]

中国的技术进步对中美两国贸易利益的影响

——与萨缪尔森新古典分析范式的比较 蔡继明 陈 臣 (238)

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

——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 刘 洋 纪玉山 (260)

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周 文 方 茜 (27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 提炼和总结六大经济实践经验

程承坪

摘 要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它没有遵循西方各类经济学说开出的“药方”，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践是理论之源”，独特的成功经济实践完全可以提炼、总结成一门新的经济学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通过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实践经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述“中国特色”，彰显“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提炼和总结中国经济实践经验，并加以一般化和规律化的理论体系。它必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贡献理论智慧，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为当下中国应对新常态的挑战提供理论指导。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有六大中国经济实践经验值得提炼和总结：一是正确处理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人民的工具价值与人民的目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三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五是正确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六是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独特竞争优势研究”(12BJL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程承坪，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邮政编码：430072，电子邮箱：2312275449@qq.com。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经济实践经验 经济学科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1979—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8%,远高于同期世界2.8%的年均增速;截至2010年,按照当年汇率计算,中国GDP总量达到58786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2位,中国人均GDP达到4361美元,迈入了中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截至2016年,中国GDP总量突破11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866美元,正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① 中国的发展没有遵循西方各类经济学说开出的“药方”,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道路,实现了比其他国家都更快、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艰苦探索、攻坚克难的结果,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践是理论之源”^②,成功的经济实践往往孕育一门新的经济学科。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其他经济理论都来自西方(习近平,200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源于中国经济实践的经济理论还没有建立起来(白永秀、吴振磊,2008),更不用说用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虽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探索和提出了诸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外开放理论、新型工业化道路等理论和观点(黄泰岩、杨宏宇,2017),但这些理论和观点都是零散性的,没有形成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还不足以解释中国成功的经济成就。因此,构建一门源于并能解释中国经济实践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体系严密的经济学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面临诸多新挑战、新难题,迫切需要构建能够适应并指导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经济学科来指导新的实践,迎接新的挑战,破解新的难题,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① 资料来源于1978—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说:“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7月1日。

构建一门新的经济学科也体现了特殊的时代意义（王立胜，2016）。新的经济学科通过提炼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保持道路选择的自主性，掌握中国道路的话语权，形成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指导中国政策的话语体系，彰显“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述“中国特色”，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王伟光，2016），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2015年11月23日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和2015年12月21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一门新的经济学科的思想。

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具有实践基础，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提炼和总结经济实践经验是构建一门新的经济学科的重要方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对哪些中国经济实践经验进行提炼和总结（杨春学，2016），我们认为，首先要有一个取舍的原则，因为中国经济实践经验有很多，不是所有的中国经济实践经验都值得提炼和总结。我们认为，值得提炼和总结的中国经济实践经验应当符合三个原则：一是“专有性”，即它产生于中国，是中国所独有的；二是具有实践指导价值，既可指导中国未来经济实践，又可供其他国家借鉴；三是具有理论价值，可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据这三个原则，我们认为，至少有六大中国实践经验值得总结和提炼：一是正确处理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人民的工具价值与人民的目的价值之间的关系；三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四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五是正确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六是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

一 正确处理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

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为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只有共同富裕，才能保证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既要发展生产力，又要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过改革开放至今40年的探索，中国找到了解决

这一难题的方法，正逐步解决这一难题。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①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做出了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路线的决定，并提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号召。此后，党中央一以贯之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无论国内外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始终不改变这一发展思路。

在传统政治经济学^②看来，计划经济与公有制^③是社会主义的两个本质特征。^④然而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阻碍作用。为了排除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发展生产力的束缚，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⑤这样就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姓社”“姓资”争论剥离了，冲破了“左”倾思想的束缚，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把公有制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会导致两个不良后果：

第一，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比重越高越好、越纯越好。

① 正如张晖明（2016）所指出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中国话语”表达。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开拓前行的。

② 目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般都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的内容，就社会主义部分而言，虽然我国根据改革开放以后的实践做了一些修改，但大多数承袭的仍然是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思想。本文所谓的传统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承袭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本文不加区别地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

③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阐述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六大特征：一是无商品无货币；二是无剥削无阶级；三是无国家；四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五是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个人所有制；六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并没有说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社会主义社会实行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是斯大林的观点。参见智效和（2007，2009）和程承坪（2017a）。

④ 公有制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也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难点。传统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认为计划经济与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与该理论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兼容有关。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表明，公有制完全能够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参见张宇（2016a）和简新华、余江（2016）。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1978年，我国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达98%^①，这与我国当时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严重不相适应，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冲破所有制改革的思想束缚，1981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进一步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②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正确定位，对冲破所有制改革的思想束缚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根据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调整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既然我国现阶段处于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追求公有制经济比重越高越好、越纯越好的思想就是错误的，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第二，给公有制及其公有财产贴上“姓社”的标签，给非公有制及其财产贴上“姓资”的标签，并对非公有制经济及非公有财产采取歧视甚至排斥、打击的态度。产生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与教条主义地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③有关。教条主义地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逻辑结果就是，公有制经济必须占主导甚至绝对主导地位，否则会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从而动摇

^① 据谷书堂的研究，197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占98%，其中全民和集体经济分别占55%和43%；在工业领域，国有企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77.6%，集体经济占22.4%，个体、私营经济基本不存在。参见谷书堂《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③ 晚年的恩格斯反对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做机械的因果论理解，他在强调经济具有“最高主宰地位”或“最终的支配作用”的同时，指出“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实践证明，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否牢固在于共产党是否建立了稳固的基层党组织。事实上，改革开放40年来，虽然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有较大的下降^①，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丝毫没有受到动摇。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领域建立了稳固的基层组织，党的政策主张能够得到切实贯彻。^②中国共产党不但在公有制经济中建立了牢固的党组织，在广大的非公有制经济中也广泛地建立了党组织。^③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极大的理论创新勇气，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桎梏，反复强调一个重要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④即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能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改变，在此条件下，不应简单化地把公有制和非公有制贴上“姓社”“姓资”的标签。^⑤可以说，打破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姓社”“姓资”的界限是继邓小平同志打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姓社”“姓资”

①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2013年公布的2012年国别经济成分数据，中国国有经济（资本构成包括国有资本、集体所有人资本、国家控股资本）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33%，该比重远低于北欧的挪威（72%）、瑞典（68%）、芬兰（56%），甚至低于印度（36%）。参见《世界贸易组织：发达国家经济放缓抑制进口世界贸易2013年继续低迷》，世界贸易组织网站，2013年4月10日。

② 我们认为，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创新，既要在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也要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传统政治经济学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出发，认为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只能建筑在公有制经济之上。事实上，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既可以建筑在公有制经济之上，也可以建筑在非公有制经济之上，关键是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稳固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即使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也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被动摇，比如苏联、东欧等。

③ 据中组部数据，截至2014年年底，297.3万个非公有制企业中，有157.9万个已建立党组织，占非公有制企业总数的53.1%，但凡具有一定规模的非公有制企业都建立了党组织。参见《2015年6月全国党员人数》，三思教育网，2015年6月30日。

④ 参见蒋金锵（2017）。我们党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源、根基。

⑤ 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是“姓社”还是“姓资”，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就是“姓社”的，否则就不是。比如，如果某个国有企业，党的领导软弱涣散，企业高层管理者腐败严重，企业经营不善、亏损严重，职工正当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那么这样的国有企业显然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因而它也不“姓社”。如果某个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建设很规范，能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员工权益能得到有效维护，企业经营合法、诚信，经济效益很好，那么它也可以“姓社”。换言之，公有制并不是自然而然地都“姓社”，非公有制也不是天然地都“姓资”。

的界限的新的突破，它必将开创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又一个崭新局面（程承坪、艾青益，2014）。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理论与词句（林岗，2016），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正是这种精神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它既促进了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也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发展，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1978年，中国GDP总量为3679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的贡献为2856亿元，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为823亿元；到2006年，中国GDP总量为219438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的贡献为68552.43亿元，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为150885.57亿元。^①2016年中国GDP达到了744127亿元，人均GDP达到了53980元^②，在面临新常态严峻经济形势挑战的情况下取得了新的辉煌成就，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国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在积极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马克思指出：在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③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④这就是说，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关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如果生产力发展了，却导致两极分化了，也不是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2015）指出：“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① 1978年和2006年中国GDP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6年7月5日采用新的核算法核算公布的数据，1978年和2006年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资料来源于田卫民、景维民（2008）。

^② 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17年1月20日发布的统计数据。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⑤ 丁峰：《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一是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① 1978—2014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亿^②，是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使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蒋金锵，2017）。党中央国务院向全世界郑重承诺，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届时中国将全面消除贫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落下。一个接近14亿人的大国，在短短42年内将全面消除贫困，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壮举，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二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我国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由1978年的133.6元和343.4元增加到2015年的9223元和21392元，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由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15年的34.8%和37.1%。^③ 同时，党和政府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旨在奠定共同富裕的坚实制度基础。

当然，我们也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我国离完全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用基尼系数（GN）衡量的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表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还比较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的GN系数达到了0.46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GN系数警戒线。^④ 这表明中国存在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尽管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与共同富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学术界也存在争议（邱海平，2016），但消除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因为分配与生产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分配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要努力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存在的问题也是发展的空间，

① 消除贫困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

② 资料来源于《统计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亿》，中国新闻网，2015年10月16日。

③ 资料来源于1978—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

④ 当然，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周文（2016）认为，GN系数超过国际公认的0.40的警戒线并不意味着中国存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现象，应当破除西方社会对两极分化概念简单化的认识。他认为，所谓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应当理解为“富的越富、穷的越穷”。但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并不存在“富的越富、穷的越穷”的现象，而是低收入者的收入也得到了较大提高，高收入者的收入提高得更多一些，因而只是一个先富和后富的问题，而不是两极分化的问题。周文的观点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中国存在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却是不争的事实。

通过消除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既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 正确处理人民的工具价值与人民的目的价值之间的关系

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①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发展以人民为动力；二是发展为了人民。前一个含义是指发展的动力来源。从发端于安徽小岗村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从城乡小摊小贩的复活到民营经济的大发展，都是人民群众自主创新、创造历史、推动经济社会变革和快速发展的生动实践和鲜活实例。后一个含义是指发展的目的。发展以人民为动力就是人民的工具价值，发展为了人民就是人民的目的价值。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把为人民谋福祉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以人为本的思想。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共享概念，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② 这一切归结到一点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③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中，始终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对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发展理念的

① 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的若干问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7期。

② 丁峰：《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扬弃。资本对经济发展既有积极促进作用，也有负面制约影响。资本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对人们逐利行为的激励较为直接而强烈，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 资本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经济危机和资源破坏等问题的累积和深化方面。^②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控制的政权手中，所以，资本的负面影响得不到有效遏制，而且负面影响不但得不到有效遏制，甚至还经常是放任这种负面影响。但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政权掌握在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共产党手中，共产党能够利用掌握的政权有效地控制负面影响。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惧怕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生产力，一方面应当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应当采取各种手段遏制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我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会产生负面影响而摒弃资本，谈资本而色变，这是不必要的，非理性的，也是不自信的表现。^③

中国共产党至少可以通过三种办法遏制资本的负面影响；^④ 一是制定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从私有制企业的外部规范、约束私营企业的不当行为；二是在一定规模的私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② 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的若干问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7期。

③ 不能认为利用资本的作用就会产生资本主义。事实上，资本主义不仅仅是指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特征的，并占社会主导形式的生产组织方式，而且更应该是指一种包含与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在内的经济制度并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在内的大系统，这个大系统的要素之间相互支持。对此可参见何顺果（1997）和李风华（2013）。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④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其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片面性时指出：“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把工场手工业分工，把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把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歌颂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同时又同样高声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些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资产阶级平时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5、465页。因此，我们认为，为了规避私有制企业的负面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从社会生产过程和企业内部两个方面规范和调节私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简言之，以政治逻辑规范、统领和约束资本逻辑。

通过牢固的基层党组织从私有制企业的内部规范、制约私营企业的不良行为；三是通过公有制企业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促使私有制企业尽可能地规避负面影响。^①实践证明，只要能够有效地遏制资本的负面影响，规范私有制企业的行为，那么资本以及私有制企业就能够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做出积极贡献。

为了全面阐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有必要厘清人民的内含。人民是区别于敌人的政治概念。巫文强（2016）认为，人民是一个历史的、政治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有不同的内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包括在“人民”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公民包括人民和敌人，因此，我们认为，除了敌人之外都属于人民。

厘清了人民概念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实意义。就经济学角度而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要表现为财产权平等保护、经济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劳动者诚实劳动所得、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收益都应当得到法律的公平保护。改革开放以前，公有制经济受到特殊照顾，非公有制经济受到排斥甚至打击。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现象有所减弱，但社会上一些人对非公有制经济和私有财产的歧视现象并没有完全消除，否则，2016年11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不会专门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来强调对产权的平等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在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经营者对财产权保护的担心时指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是我们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实现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

^① 张宇认为：“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企业普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和政策含义是什么，通过什么机制来落实这个中心，都是需要通过理论创新才能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文提出的看法可以视为对张宇这一关切的一个回应，或者说是对他的关切的一种探索性回答，以期抛砖引玉。参见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的若干问题》，《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7期。